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杂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杂文集

曾彦修 秦牧 陶白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94880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7·北京



1194880

本分集主要编辑人员

主 编 曾彦修 秦 牧 陶 白

主编助理 常君实

责任编辑 常君实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杂 文 集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华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6开本 61.5印张 6插页 1287千字

1987年 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 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书号:10355·113 定价:(精)17.55元(平)14.90元

出版说明

(一)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十多年来，中国的新文艺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深刻地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它是本世纪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对于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编纂一部反映“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优秀成果及其发展历程的拔萃本总集，目的是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研究、总结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衍变的规律和历史经验，提供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我们也期望这部总集，能帮助广大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选择精英，统览各个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从中汲取教益；并能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和研究中国的新文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二) 《中国新文艺大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精选、严选、拔萃与代表性相统一的标准，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反映我国新文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概貌。

(三) 《中国新文艺大系》按历史时期分辑，由近及远地编纂出版。从“五四”运动前后到一九八二年底，共分五辑：第一辑〔1917—1927〕；第二辑〔1927—1937〕；第三辑〔1937—1949〕；第四辑〔1949—1966〕；第五辑〔1976—1982〕。若干年后，将续编以后的各辑。

《中国新文艺大系》每辑按文学艺术的门类和体裁分集，各辑的分集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所有分集均有主编撰写的导言。全书索引及必要的资料将在适当的时机另行编辑出版。

(四) 这次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共二十三集。其理论部分包括文艺基础理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文学部分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包括通讯、特写）、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部分包括戏剧（话剧、戏曲）、电影、电视、曲艺、音乐（声乐、器乐、歌剧）、美术、摄影、舞蹈、书法、杂技；此外，还有一集史料。

优秀的长篇小说本辑不列分集，其目录由《史料集》收选。香港、澳门、台湾作家的作品，因资料不全，难于精确选拔，暂不收录；俟条件具备，另行增补。作品编排一般以首次发表时间或所据版本的时间为序，少数分集分类后再按时间先后排列。注释一律采用原著，凡编者新增加的，均有说明。个别作品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少量的文字改动或由编者订正讹错。

(五) 《中国新文艺大系》的编纂，是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依靠文艺界的大力支持、组织广泛的社会力量进行的。工作中我们还得到有关部门及海内外专家、读者的热情赞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并恳请惠予教正。

中国新文艺大系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九月

导言

曾彦修

对于杂文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原则性意见和看法，我在《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的《导言》中已经有所陈述，本册不赘。由于本卷杂文集的出版在1949——1966年卷之前，因此，有关解放以来杂文发展的简单过程只好放在这里一并回顾一下。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杂文的命运同党和人民的命运是完全分不开的。凡是党和国家处于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年代，杂文也就处于兴旺发达的状态；反之，杂文也就必然处于完全凋谢甚至一般地被认为是“毒草”的年代。这种杂文同党和人民的休戚兴衰如此明显地形成同步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已经成为规律性的现象了。这就完全足以从总的方面说明杂文决不是一股邪恶的力量，而是一股扶正祛邪、去腐生新、奖善惩恶、爱党爱国的正义力量。这个规律性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杂文的最大光荣。国家兴，杂文兴；国家乱，杂文亡——解放以来三十五年的杂文史，简单说来，就是这么两句话。解放后当然也有不够正确以至错误的杂文存在过，但总的说来，属于右的错误倾向的杂文，大体上是单个的，而不是全国性的、长时间的和连篇累牍的；反之，情况可就大为不同了。这有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后到一九六六年“文革”以前相当一部分批“右”的杂文为证（“文革”中的杂文性质就没有必要去讲它了）。杂文离不开政治，因此，在它本身表现出来的偏差中，三十几年来也同样是以“左”为主的。当着政治气候十分严峻的时候，除了少数头脑清醒者的杂文以外，杂文也大多是很严峻的、反“右”的、鼓吹急躁冒进和打倒一切的。它们往往是“大批判”中的“小批判”。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把杂文同“右”、“反党”这些概念奇怪地联系在一起呢？那是因为有些同志认为，凡是批评错误的东西的批评本身就叫做“右”，只有批“右”的东西才是永远正确的。他们认为组织不可能有错，上级不可能有错，大小领导人也不可能有错，就是错了也不能批评，谁批评了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轻则“右倾”，重则“反革命”。原来任意加给杂文的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是有深远的政治历史背景的。

但是，保持清醒头脑的杂文，长期以来它们往往是现成的“出头椽子”，经受的打击是最迅速、最普遍、而又最沉重的，这一点大概谁也不会否认。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杂文同“反党”、“毒草”之类的罪名就差不多可以画等号了。因此，在杂文问题上的冤假错案特别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解放初期，只有个别报刊上有一点零星的杂文，此处不多论了。

但是在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春夏间，却有过第一次杂文的兴旺。那时佳作不少，杂文在文风上的特点也相对地更象杂文些，有很多文章至今更能看出它们的预见性和正确性。这些文章的不少作者的后果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当然是一种不幸。但它同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遭到的大不幸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对这类事这里不想多谈，现在也不是谁能谈得清楚的。

此后，从一九五七年夏天的“反右运动”起，中间又经过了“大跃进”的几年，这时期也出现了不少杂文。不过这些杂文中的大多数是反“右”的，鼓吹“大跃进”和帮助刮“共产风”的。张春桥这个当时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革命两面派，在一九五八年就是以一篇宣传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实际上是鼓吹全国吃“大锅饭”的反动杂文而爬上高位的。同时期，姚文元也写了不少杀气腾腾的反“右”杂文。他们二人的极左杂文，口气不凡，备受宠幸，流毒全国，罪恶极大。今天看来，对于这段时期不少左倾倾向很明显的杂文所起的消极作用是应该永远引以为戒的。但是，有的同志认为那些鼓吹极左政策的杂文不能算在杂文之内，可以不去提它。但也有另外一种见解则恰恰相反，认为一九五八年以后的杂文才是杂文的正道，这以前的杂文的基本精神都不对头。我觉得，时至今日，历史已经作了结论，此地不拟多论。

经过全国性的长达数年之久的虚假的“大跃进”和不断的反“右”斗争引起了严重破坏之后，有少数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实在忍不住了，他们首先拿起笔来用迂回曲折的方式批评以“大跃进”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一九六

一年三月，邓拓（让我们永远怀念他吧！）用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开始发表《燕山夜话》杂文。同年十月，吴晗、邓拓、廖沫沙又以吴南星的笔名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始发表《三家村札记》。当时的形势早已无法照实讲话了，于是《夜话》和《札记》便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¹²振奋精神”为指导，实际上是号召人们冷静下来，学点知识和科学，注意实事求是，注意改正主观主义的错误。国内有些省报也相继效法，设置杂文专栏，重点也是提倡学点老实有用的知识，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等。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的两年以后，他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为纪念党成立四十周年写的《四十而不惑》一篇杂文中又一次响亮地提出：“同志！你有病，要请医生！什么病？神志不清病。用什么药方？调查研究汤……”这是对几年来的“大跃进”、共产风、假大空等的一服多么有力的清凉剂！不久，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全国党政军七千名各级领导干部的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和无数个“大办”等所造成的极端的经济困难的教训。经过传达之后，全国干部的认识提高了，这是杂文得以发展的较好的条件。这年五月起，《人民日报》也追了上来，开辟了一个名叫《长短录》的杂文专栏，由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五位老作家轮流执笔，其基本性质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差不多，不管它们在形式上谈得有多宽多远，但实际上都是想用各种方式来谋求恢复实事求是的、追求真知的唯物主义精神的。

经济工作由于七千人大会的影响，大家知道情况太危急了，此后，在实际工作中是着重致力于经济工作的恢复和发展的。可是，饥馑现象稍有缓和后，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空前地强调了抓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甚至到了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程度。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当时由于康生们具有一个特定的目的，他们还主要是在《刘志丹》等个别小说上大做文章，¹³就是所谓“利用小说反党”，必须大整特整的问题。其实，他们的醉翁之意本不在酒，

根本目的是想借此来达到他们否定一个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作用，并同时借此发动一场扫荡在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的运动罢了。此外，这时期主要还从电影开刀，以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红日》《聂耳》等为名，来否定三十年代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巨大成绩，为江青的掌权准备条件。因此对于一九六一年以后两年间各地用各种方式变相地批评左倾错误，要求恢复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精神的第二次杂文高潮，竟然出人意外地被江青、康生们暂时放过去了，这是一件很奇怪但又不大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当时主要的目的在抹煞各个老红军根据地和多年来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英勇献身和成绩，在颠倒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功罪，主要为制造“现代迷信”加紧扫清障碍，因此就暂时把写作杂文的一批书生放过去了，而留待以后再来彻底收拾。

但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被特别强调，即一九六二年冬以后，各报的杂文都自然而然地相继偃旗息鼓了，《人民日报》的《长短录》也在挣扎了半年之后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停刊了。^①

应该说，这一次杂文高潮的历史意义是光荣的，因为，在一九六一至六二两年中，杂文几乎是孤军奋战地在那里用多种比较缓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来同左倾错误作斗争，这是有充分事实作根据的。象张春桥、姚文元这样总是以极左面目出现、专写假大空、反右倾、打倒一切的反革命两面派，竟然可以上升到党和国家的重要掌权人的地位，而讲真话的作者中不少人却已经不会说话了，他们的“罪”就是他们讲了几句真话。这真是一件令人极其痛心而又极其难堪的事。牺牲者已经成了殉道者，人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二

十年内乱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林彪、江青两个互相利用而又各怀鬼胎的反革命集团，在“文革”大破坏一开始时他们是兵分几路的，一路是揪三十年代的所谓“文艺黑线”，一路是揪所谓“反毛泽东思想”、要搞“政变”的“彭陆罗杨”，还有一路就是揪北京市委以及北京市委领导下的

^① 关于一九六〇年后至“文革”前的杂文发展史的简单叙述，是参考蓝翎、高启祥、何北仁、魏桥等同志的多篇论文写成的，谨在此表示谢意。

报刊上的所谓“三家村”即抓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同志写的杂文《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倒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领导人为首的全部党政军文老干部，来一个彻底的篡党夺权。杂文在这次十年内乱中就这样成了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发动叛乱的第一批重点打击对象，全国的杂文作者们自然不大有人能够跑掉。以后，林、江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就逐渐利用起杂文这一写作形式来了。这并不奇怪，正象其他文艺形式也曾被他们利用过一样，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以极左面目、甚至极端反动面目出现的错误以至反动的杂文也有一些（它们的作者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出于个人的私心，不一定同他们的帮派有组织关系）。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种乌烟瘴气的东西更多，例如，在他们直接控制下的一个反动刊物上，竟然出现了象《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这样令人恶心而内容十分反动的所谓“杂文”，那就简直是对杂文的极大侮辱了。（有的研究者说，在十年内乱时期，也有个别用巧妙的方式来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公开发表的杂文，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还有待于今后研究者更多的发掘；这里因缺乏材料，不能肯定。）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头子们被捕了。这一下，人们胸中长期积累下来的国破家亡的悲愤，和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不共戴天的仇恨，一下子就象炽热的地下熔岩一样地喷发出来了。杂文又有如万箭齐发，全都一齐射向江青反革命集团。但是我们这本杂文选，对这个时期的杂文选录得并不多。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前的杂文，往往还留有不少“文革”的痕迹，提法上也还有不少不妥之处，因此要多选也很困难。

但是，这一时期也有很好的文章。例如，秦牧的《鬣狗的风格》一文（载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就是一篇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的杰作，也可以说是一篇重振杂文旗鼓的代表作。

从一九七八年夏天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后，杂文作者们的思想得到了一个相当的解放。同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在历史新时期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重新明确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跟着，第二年的春天，党中

央又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一系列理论、政策、方针和指导思想的教育下，杂文作者的思想又得到了更大的解放，同时又在政治上有所遵循，注意不要使自己滑到右的错误中去。一九七九年九月底，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实际上是代表党中央对建国三十年的历史总结提出了一个轮廓。讲话在充分肯定建国以来党和人民取得了伟大成就的同时，又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某些批评。他讲，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接着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讲起，连带及其他错误。这对于振奋全党全国的人心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此后，中央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极其重要的口号。写杂文的同志们在这些决议和讲话的鼓舞下，感到十分兴奋，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目标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的。现在有了中央的号召和强调，他们就更有工作的方向、动力和信心了。因此，从一九八〇年以来，杂文就明显地多起来了，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这些大量杂文的内容，大体上都是围绕着以下一些中心问题：反对左倾遗毒；批判和揭发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反动理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拥护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赞成和推动解放思想的运动；拥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积极致力于三个根本好转的宣传；批判官僚主义；鞭挞以权谋私；反对思想僵化和因循守旧；大力提倡掌握科学文化，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其重要的作用；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败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大力提倡爱国主义，维护民族尊严，同时反对闭关锁国的顽固腐败思想；歌颂各种典型的好人好事；等等。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杂文的思想艺术水平固有高低之分，但鼓吹或散布错误与腐朽思想的东西确不大听说。大体说来，这几年的杂文都没有离开上述这些思想。这几年中，一批老作家（以下不分次序）如秦牧、林放、陶白、冯英

子、蓝翎、黄秋耘、吴有恒、牧惠、章明、舒展、舒芜、秦似、于浩成、宋振庭、谢云、余心言、吕剑、刘征、邵燕祥、吴钢、鲍昌、虞丹、公今度、岑桑、老烈、卢杨村、陈泽群等人，都值得注意，他们写出了一批或大量思想比较深刻或很深刻的杂文。经过十年炼狱的锻炼，在目睹了人民流了大量的鲜血之后，必然会有一批人民的作家站立起来昂首挺进。虽说鲜血把他们惊呆了，但是也把他們惊醒了。他们已无所畏惧，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之外，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牺牲了。这个时期，秦牧除继续写他的优美的散文外，还写了不少思想深刻、说理细密、战斗性很强的杂文，这在这位老作家身上可以说是一个划时期的跃进。前面已提到过他的《鬣狗的风格》一文的重要性。这是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地刻画和鞭挞丑恶的东西的。他还另写了一篇题作《石壁树丛之歌》的杂文，这是歌颂一切老革命家、老共产党人的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挺拔风骨和在任何艰难困厄条件下都有无比茁壮和无比旺盛的生命力的。这篇文章过去没有引起读者的很大注意，但它确是一篇寓意很深刻的力作。它反映了作家高尚的灵魂和极其敏锐的观察力，这些我以为都可以说是杂文的典范之作。（本文多举秦牧的杂文为例，是因为以一个人的作品为对象来讨论，要便于比较些，此外再无它意。）林放则以七十高龄，写了大量忧国忧民、说理通俗易懂、推心置腹、直言切谏，而以短小精悍为主的杂文。陶白（东方既白），一位党的老战士，他以他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丰富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学知识为基础，怀着对党、国家、人民和青年炽热的爱与忠诚，以天下安危为己任，掬尽忠贞，为去腐生新奋笔写作，成绩斐然。冯英子，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进步新闻战士，自称是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才“学写杂文”的，但他博闻强志，熟悉中国史事和古典文学，思想明敏，正气磅礴，大义凛然，运用资料，如数家珍，行文流畅自然，一片爱党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蓝翎，他是一九五七年的入网者之一，但在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象其他类似的人一样，象凤凰涅槃一样，经过二十多年的熬煎以后，勇气反而倍增了，加上二十多年学问上的积累，他写了大量大胆的、有远见的、学识丰富的、尖锐批判一切腐朽事物的好文章，风格挺拔，令人起敬。牧惠（林文山）、章明，他们既善于写思想深刻、见解独特而不多借重材料的杂文，又善于写那种融会贯通了大量资料左右逢源信手拈来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杂文。牧惠写的《元宵节的来历》，资料丰富有趣，议论生动，给人以深

刻的印象；章明的《论“赔本赚吆喝”》，深入浅出，幽默讽刺，令人发笑（当然也令人心痛）。这两篇文章都是批判“打肿脸充胖子”那种可悲可笑的作风的，它们的风格却迥然不同，但都很成功。这两篇文章告诉我们：一个大致相同的主题是用多么不同的风格方式来表达，杂文创新的天地又有多么广阔啊！有些老杂文家仍然宝刀不老，继续写出大量战斗性很强的杂文，例如秦似等同志。

由于见闻狭窄，尽管有意要多选一些中青年作者的作品，但完成得不好。虽然如此，本集中仍然有不少中青年的好文章，例如，李庚辰的《把不是脸的地方去掉》，文章别开生面，思想深刻，告诉了一个要保全或恢复“脸面”（实际上就是政治上、道德上的名声）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张雨生的《虎皮鹦鹉之死》，主要的是劝导一切青年，尤其是他们的父母身居各级领导的青年们，决不要依靠父母的余荫过活。这类文章多得无法数计，但是这篇文章却别开生面，使人一读难忘。蒋元明的《走出“罗汉堂”》是反对官僚主义、机构臃肿、官职泛滥的，但他的写法也很特别，还提出了一个“精官简政”的口号，读后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陈小川的《落俗与脱俗》是反对各种各样的庸俗化和低级趣味的，对比鲜明，比好些同类文章的观察也要深刻些。盛祖宏的《得奖人到哪里去了？》，是说一个什么作品的发奖大会，在新闻报道中只有一串大大小小的官名或名流名，却没有一个受奖者的人名的怪事。鲁迅讽刺过的“中华官国”竟正式出现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中，只要把这件事情提出来点一下，就是一篇第一流的讽刺文章了。张聿温的《还要提倡一下做“平原君”》，认为一般人议论毛遂自荐只及于毛遂而止，是远远不够的，应当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平原君能重用毛遂。这种独到的见解，既符合历史的真实，又值得我们今后永远引以为范。此外好文章还很多，但因为不熟悉年纪，怕把老年当成中青年，就不多举了。上述这些文章，还没有能超过一些老杂文家的佳作，因为它们的内容还比较单薄，思想的深度与广度都还不够，但是它们都已具备了杂文的主要特点，同一般的所谓政治思想短评，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它们已经是真正的较好的杂文了。

用杂文形式来写不追求系统化的文学艺术评论，既好懂，又容易发挥独特的创见，是读者很喜欢读的一种文章。本书原拟多选，终因工作不到家，书中选得较多的只有王朝闻、卢杨村、陶雄等同志的文章。对于应该选而未能

选到的一定更多，对此，我们只好表示深深的歉意。这类文章善于以短小的篇幅来发表见解深刻的文艺短论，又兼有启发其他方面工作即举一反三的作用。它的效力往往超过一篇沉闷的、架势很大、怪名词很多的长文章。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这几年又产生了一批大有希望的中青年杂文作者。这些作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喜欢读书，知识面较广，他们的新知识往往比老作家为多，他们都十分关心党和国家以及广大人民利益的大事。他们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道路上，一面沉思，一面前进，以复兴中华、加速两个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为己任，用文章来增进同代人和广大青年朋友们的政治、道德、科学文化、物质生活、恋爱婚姻……等方面的知识、修养和幸福，也用此作为批评和帮助消除某些人身上的消极和污秽因素的武器。为此，他们作了巨大的努力，有不少人都写了大量的好文章。诚然，他们的文章中，有的是一般性的政治思想评论（这一点，好多老杂文家也不例外），但有相当一部分却应该说已经是真正的杂文了，虽然，其中有不少文章的“杂文味”还不太够。但是，从他们努力增进学识，爱憎分明，无限关心党和国家的利益和青少年前途……等多方面看来，今后杂文创作的前景不但是后继有人，而且数年之后，他们就会成为写作杂文的主力军，并且一定会从中产生出比过去为多的著名杂文家。杂文发展的希望，在目前，百分之七八十已在他们身上，再过几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希望就都在他们身上了。这次编选这部杂文集时，由于事先没有强调要注意多编选一些中青年的作品，所以一九八四年春集中各省市来稿时，发现中青年作品不够突出（这应该由负责日常主编事务的我负责）。这是应该弥补的。不得已，只好在同年七八九三个月在北京召开了三次中青年杂文作者座谈会，请他们推荐外地及本市的中青年的杂文。终因对外地了解很不够，联系不灵，虽然在最后几个月匆匆地增加了若干中青年作者的文章，但多数还是北京作者的，这一点是十分令人遗憾的。现在我们知道是中青年而选文较多的有（名单不分次序）：金戈、蒋元明、李庚辰、张聿温、孙士杰、盛祖宏、杜畏东、谷春旺、陈小川、张雨生、商子雍、陈冠柏等。其中，陈小川、张雨生、商子雍等几位更引人注意。我们没有收集到的中青年杂文作者的好文章一定更多。对这一遗憾，我们将另选编一本这几年的青年杂文选作为补救。

三

这里准备谈一点对杂文文章风格的看法。这个问题对近几年及今后杂文发展的关系很大，因此在这里特别提出来谈谈。

一篇文章究竟是不是杂文，同它的表达方式是绝对分不开的。杂文里面的思想、议论或寓意，一般地说，主要应该通过形象化的东西来感染人，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它的议论部分虽然很重要，但在文字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却是可长可短的；有的议论只是画龙点睛似的，有一两句就可以了，多了反而累赘。但有某些杂文也可以全部或基本上都是在发挥议论的，不过它那发挥议论的方式多半是很独特的，或者夹叙夹议，或者穿插很多有趣的史实和其他内容等，这种发议论的方式同广东人的“讲古”、四川人的“摆龙门阵”一样，要娓娓而谈，绝无书呆子和教训人的口气。鲁迅的杂文就什么形式都有，唯一不用的形式就是摆开架势板着脸孔的枯燥论文。

现在有些文章强调杂文的“知识性”。我以为“知识性”可以是一部分杂文的重要要求之一，但不一定是表现在杂文字面上的基本特点。杂文究竟不是知识小品文。谈杂文的知识性，我以为主要似乎应该指这么两个方面：一是指写杂文的人要有广泛的学识，这样，他写起文章来才能左右逢源，引人入胜。二是指为了使文章形象化有时不得不多用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但是这些知识不可能是系统的，它不过是作者用以发表议论的一点因由，通俗一点说，就叫借题发挥。而借题发挥是写杂文的一个正道。谁要以此来谴责作者，那不过说明谴责者的无知而已。象鲁迅写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点比喻》、《夏三虫》等，他们的思想意义都很深，教育意义很大，可是字面上的知识性却一点也没有。关键问题是杂文作者要有比较广博的学问作基础，才有可能涉笔成趣，以加强杂文的生动性和形象性。

当前，世界是处于所谓“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杂文作者光有一点古老的文史知识显然十分不够了，这就需要杂文作者特别是中青年杂文作者努力学习新的科学知识。例如，“知识大爆炸”这个词就是借用宇宙学中的“大爆炸”理论而来的。这个“大爆炸”理论说，宇宙是从某一个能量无限大、密度无限高的“奇点”的“大爆炸”开始（爆炸开始的瞬间连原子也还没有

形成呢)，现在已经可以算出宇宙的大致“年龄”，现在的宇宙还在不断膨胀，今后的宇宙最终仍要缩为一点归于消灭等。这些都已经有了些观察证据、实验证明和科学预言的被证实而作出某种判断了。因此，它已为当今多数宇宙学者暂时承认。我们写杂文的作者如果仍然靠讲几个老故事发议论，能够引起青年读者的兴趣吗？报载邓拓同志平均每半个月要读完一本自然科学著作，可见他的博学多才完全是从勤勉好学中得来的。

杂文要能引人入胜，除了要求它必须有较深刻的思想或兼有有益的知识之外，那就要看文章的艺术性如何，即通常所说的“文采”如何了。如果允许我暂时把这个词分开来解释的话，那么，我把“文”用以专指优美的文字，“采”则指鲜明、浓烈、深沉的思想感情色彩。因此，优美的文采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字修养问题。它是有一个前提的，这就是要求作者一定要有丰富而炽热的感情，对人民的利益和命运，对祖国的眷恋和热爱，对光明和正义的憧憬，对党和社会主义前途的关切，都必须抱有无限的忠贞和信赖。只有具备了这些，才有可能象梁启超所说的“笔尖常带感情”那样（其实他本人并没都做到——且不说他的感情是否全对），字里行间自然会充溢着爱国爱民，爱党爱社会主义，爱真理爱科学，爱正义爱光明的感情。如果没有这份感情，随便你的文字技巧多么高明、知识多么广博，你的杂文也是很难打动别人的感情的，因为首先你自己就没有怎么感动。这往往是在作文字消遣，这有周作人的一部分杂文和“幽默大师”林语堂特别是他的门徒或私淑弟子的相当一部分杂文可作证明。鲁迅的杂文，就几乎可以说篇篇都是充满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光明和正义，热爱真理和科学的感情的。他的这种感情的表达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象火山爆发一样的炽烈，有的则象地下潜流一样的深沉。他的各种感情的色彩是极其丰富的，这一点，是任何写作杂文的人都应该引为典范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再从严要求文章应该生动活泼，清新流利，深邃洗练，沉着有力，既犀利明快而又要有点含蓄，幽默而又不要流于轻浮，讽刺而又不要流于尖刻，优美而又不要流于靡丽，雄浑而又不要流于粗鲁，是正义的谴责而不是随意的攻讦，是热情的歌颂而不是庸俗的捧场。至于莫名其妙地说一大堆废话，既肤浅又噜嗦等，那简直是开杂文的玩笑了。写作杂文有点象作画写生一样，首要的要求是“神似”，而不是“形似”。凡以为东拉西扯，多说几句俏皮

话、玩笑话、挖苦话，或文言白话、之乎者也夹缠一通之类便是“杂文”的，那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完全是走上邪魔外道去了。十分遗憾的，是确实有这样的文章，这种作风当然是无法令人称赞的。

杂文自然要求尽可能的短小精悍（当然，长达数千字甚至更长的也完全可以写成好杂文），因此它一般只能单刀直入，突出地议论某一点，而不可能写成面面俱到的长论文；但是在思想方法和写作态度上，就仍然要求它力避片面性，实事求是。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杂文在行文上，有时是难免要用一点幽默、讽刺或者夸张手法的，这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否矛盾？我认为可以不矛盾，但这必须是艺术上允许的幽默、讽刺或夸张。因此，对这些方面的限制如果过于严格，杂文就只好搁笔了。有人会说，杂文搁笔有什么不得了？少出点麻烦更好，地球照样转。不过，历史已经几次证明，一到了杂文搁笔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情况也就不大妙了，这是一个很准确的晴雨表，比地震预报要准确的多。

杂文应该多样化，但是文章的格调却必须尽可能的高一些，虽不一定都能做到掷地能作金石声的程度，但恐怕也要有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精神才好。不然，有人就说鲁迅一去，或者说解放以后，就是广陵散绝，再也没有杂文这回事了。这个说法我以为很不全面，不能成立。应该说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杂文，特点不能都象三十年代一样。以个别的杂文作者来说，至今没有人能达到鲁迅的学识水平和思想深度，这是事实；但是集合众多的杂文，则杂文这一文学形式就不是已经断绝而是大大地发展了、丰富了。

思想要深一点（包括感情要丰富热烈在内），学问要广一点，格调要高一点，这几个要求恐怕可以说是杂文写作的共同要求了。杂文是灵魂的净化剂，思想的开窍机，同时又是文章的“竞技场”，十八般武艺都可以在杂文领域里大显神通，不受什么限制，这里确是一个很好的文章竞技场。

四

这次在读完各地区选来的几千篇杂文（经过各省区甄选后留下来的）和若干本杂文集后，感到这几年发表的大量杂文，在优点和缺点上都是很明显的。

优点是，这些杂文基本上都是针对着社会上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针对